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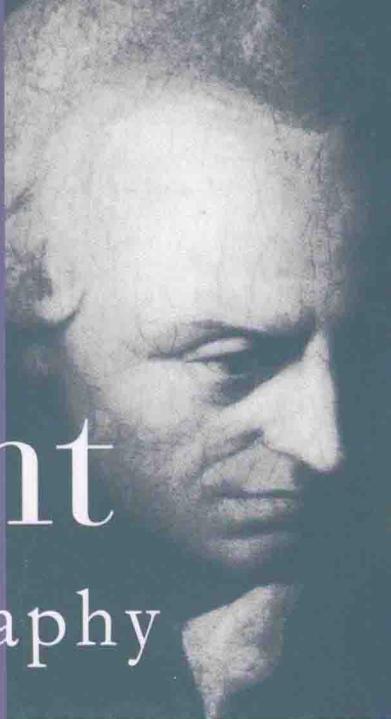
| 人物 · Biography

CAMBRIDGE

Kant: A Biography

Manfred Kuehn

Kant A Biography



Immanuel Kant

康德传

〔美〕曼弗雷德·库恩 著

黄添盛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康德传

Kant: A Biography

[美] 曼弗雷德·库恩 著
Manfred Kuehn

黄添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德传 / (美) 库恩 (Kuehn, M.) 著；黄添盛译
—2 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书名原文：Kant: A biography
ISBN 978-7-208-12115-7

I. ①康… II. ①库… ②黄… III. ①康德. I. (1724~1804) —传记 IV. ①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8015 号

责任编辑 李 頤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美术编辑 高 煦



康德传
[美]曼弗雷德·库恩 著
黄添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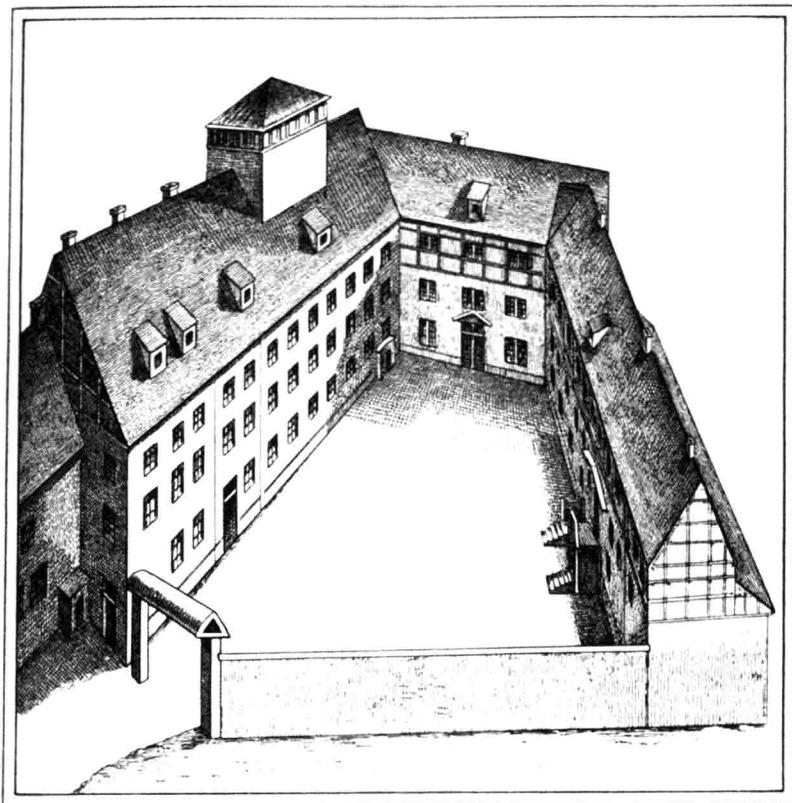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毫米 1/16
印 张 41.25
插 页 4
字 数 534,000
版 次 2014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115-7/B · 1049
定 价 63.00元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反复地思索，
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
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
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康德墓志铭



伊曼纽尔·康德，1791年（戈特利布·多普勒[Gottlieb Doppler]绘的微型人像画，
1791年，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18世纪的腓特烈中学 (Collegium Fridericianum)



康德的房子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古堡和康德的房子

献给玛格丽特

目 录

哥尼斯堡的中国人（代序） 谢文郁.....	1
作者识	15
人物表	17
康德生平与著作年表	23
前言	31
第一章 童年与青少年时期（1724—1740）	55
第二章 大学生与家庭教师（1740—1755）	93
第三章 优雅的硕士（1755—1764）	132
第四章 重生及其意含（1764—1769）	180
第五章 沉默的岁月（1770—1780）	225
第六章 “粉碎一切”的形而上学批判（1780—1784）	277
第七章 道德形而上学的创始人（1784—1787）	318
第八章 与教会和王室的摩擦（1788—1795）	373
第九章 老人（1796—1804）	435
注释.....	475
参考书目	597
索引	617
编后记	651

哥尼斯堡的中国人（代序）

谢文郁

中国思想界的康德热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可谓持久不衰。眼下这本《康德传》，我想，会给这一热潮继续加点温。按着这本传记作者的想法，他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康德人格。当然，他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恐怕不是他说了算。但是，至少有一点他说对了：我们必须让康德活起来。

追究源头，中国思想界的康德热大概有两股原始力量。一股来自李泽厚先生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角度解读康德；^{*} 一股来自牟宗三先生从康德道德哲学角度谈论中国儒家心性思想。^{**} 这两股力量都出现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左右，它们的推动力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到。当然，这两种关于康德的解读是否准确？是否令人满意？——这自当别论。但是，这些年来人们在康德著作翻译和研究上可谓是不遗余力，归根到

* 参阅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一版）。国人研究和讨论康德思想当然要早于李泽厚的这部著作；但是，康德思想真正进入中国大陆思想界，在我看来，乃始于此。

** 牟宗三翻译并注释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82 年）；《康德纯理性之批判》（台北：学生书局，1983 年）；《康德判断力之批判》（上篇，台北：学生书局，1992 年；下篇，1993 年）。对于新儒家来说，这种解读使新儒学运动有了某种底气。关于牟宗三的康德学，参阅林安梧“牟宗三的康德学及中国哲学之前瞻”，载：《鹅湖》30：2（总 362），2005 年 8 月。

底，其动力来自所谓的追求康德解读准确性情结。^{*}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上述两股力量的能量。难怪乎有人戏称，中国人对康德的理解之准确性超过了西方人。既然是戏称，我们千万不要去追究其合法性。不过，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中国学术界有了一块分量不轻、范围不小的康德学地盘。

略略浏览一下这块地盘，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康德虽然位居地盘的中心，但看上去不过是一尊毫无生气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模糊形象。换句话说，中国康德学所呈现的康德甚至不是一个思想者，而仅仅是一堆和生活没什么关系的抽象概念。有人美其言曰：这才是纯粹哲学！比如，人们津津乐道的康德晚年那像钟表一样呆板而准确的生活节律，以此说明康德思想的严密性和精确性。于是，我们获得这样一个康德印象：没有生活趣味、没有生存关注、没有情感发泄、在思想上精益求精、除了思辨还是思辨等等。这是一个概念化了的康德。

康德作为思想家是活生生的。但是，康德是怎样一个活生生的思想家呢？康德在世时就有不少人给他写传记。因为康德的巨大威望，康德生前还没有几个人敢说他的坏话。所以，这些传记都只是挑好的说，好像康德是一个世人的楷模。不过，晚年的康德因为出版他的一篇关于宗教的文章（后来收集在《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二章），和当时的政府书报检查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 在政府官员看来，康德的基督教信仰出了问题。在路德宗基督教信仰主导的德国社会，基督教信仰出了问题就是人格出了问题。随着他的死去，有意无意地附和政府的意见开始谈论康德为人处事时的各种负面故事，甚至康德关于他妹妹没有文化的说法也成为话题。这种谈论让康德的一些生前好友十分不爽，激发了他们撰写康德传记以正视听的冲动。这些后来的传记企图调解康德宗教思想中的反基督教信仰的因素，把康德描述为至少是拥有虔诚信

* 比如，李秋零教授和邓晓芒教授分别着力的康德著作翻译和出版。如此投入精力和时间，归根到底离不开“准确性”情结。

** 参阅康德 1794 年 10 月 12 日致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信。收入李秋零编译《康德论上帝与宗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513—515 页）。

仰的好公民。^{*} 这样一来，不同传记版本呈现了不同的康德形象。于是，康德的性格就出现了多元化。

也许，这个多元化是我们深入了解康德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切入点。我们知道，康德生活于其中的德国是基督教路德宗信仰主导的国家。准确地说，康德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哥尼斯堡度过的。当时的哥尼斯堡由敬虔派（路德宗中的一个新兴派别）所控制。敬虔派的对手主要是路德宗正统派。正统派看重的是教义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在路德宗教会强行实施统一的教义，而对于教义如何落实到人的生活中这样的问题则不了了之。这种倾向导致了正统派神学和信徒生活的脱节，使信徒的宗教生活流于形式和呆板。于是，如何造就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这一关注便凸显出来。敬虔派之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较好地回应了这一关注。对于敬虔派来说，基督徒生活的关键点是敬虔和顺服；至于教义，敬虔派不加强调，但在神学上也不和正统派较量。既然问题出在基督徒的生活上，敬虔派认为，基督徒必须重视自己的信仰重生经验，经历在上帝恩典中的自我更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在读经祷告中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过一种严格的遵守律法的道德生活，活出基督的样子。在组织上，敬虔派要求信徒过一种小教会的生活，即团契生活，目的是让信徒建立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彼此扶持。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所谓的“彼此扶持”演变为“相互监督”，把基督徒的团契生活转化为一种道德上的修养，维持共同道德规范，甚至允许教会领袖把自己的意志加在信徒头上。

康德出生于敬虔派家庭，一直到中学都接受敬虔派的严格教育。不过，康德在经历敬虔派教育时发现自己身处两种绝然不同的环境，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它们对康德的生存关注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一个是康德从小生活于其中的敬虔派家庭；一个是康德中学时期就读的敬虔派中学，称为腓特烈中学（以当时在位的普鲁士国王的名字命名）。家里和学校的生活绝然不同。在家里，他体会

* 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参阅本传记的前言。

到了父母的敬虔给他带来的是温暖、安全、可靠。在学校里，敬虔派教育严格要求的反省、监督、自制等等则给他留下了恐惧、害怕、奴役的记忆。

这两种敬虔派环境对康德的生活都是切身的，同时是矛盾的。它们在康德身上留下了一种充满张力的情结。我们注意到，对于学校里的敬虔派教育，康德只有坏印象。康德成名之后常常谈起中学教育的那种在外在要求中反省自我的虚伪，那种在他人监督中培养的奴性，那种自以为完美的自制带来的傲慢等等。康德的这些评论解释了他为什么在上大学之后离开教会越来越远，以至于不参加教会活动，临死前拒绝牧师的安慰祝福等等。康德关于教会的消极评论和态度往往被用来支持如下论断：敬虔派教育在康德身上没有留下积极的影响！然而，我们也读到，康德在评价敬虔派时使用了这样的语言：“那些真正严肃的敬虔教徒散发尊贵的气质，并拥有作为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高品德，即静穆、喜悦与不为激情所扰动的内在平安。没有任何困境或压迫可以令他们不悦，没有任何争端可以激怒他们或让他们产生敌意。”^{*}这里谈到的“真正的敬虔教徒”，便是康德在他父母的怜爱关怀和循规蹈矩中所感受的敬虔派；它是康德所向往的敬虔派。追本溯源，我认为，它也是康德的道德哲学所展示的敬虔派。

我们继续追踪这种带着张力的情结在康德思想中的走向。我们知道，康德道德哲学是从善良意志出发的。意志为什么是善良的？这是一个情感性问题，是不可能用理性加以说明的。当然，从情感上看，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必须是绝对可靠的。对于康德来说，只要他觉得它有不可靠之处，它就不可能成为他的道德哲学出发点。康德宣称，善良意志是生存的出发点。我们读康德的道德哲学，发现这一点对他来说是一个不争的生存事实，是他的情感所系；否定它等于否定他的生存。情感不是论证，而是在生存中培养出来的。我们感兴趣的是：康德在他的生存中是如何建立这一情感的？

* 参见本书第 71、72 页。

康德的中学教育不可能培养这种情感。康德在评价他的中学教育时常用这三个词：虚伪、奴性、傲慢。逐一分析这三个词，我们发现，康德在腓特烈中学所接受的敬虔派教育不但不培养他的“善良意志”情感，反而对此有严重的抑制作用。

第一个词是虚伪。我们知道，敬虔派强制性地要求学生自我反省；自我反省只能从自身出发。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从自身出发进行反省，他就不得不虚伪地回应外在的强制性。因此，在康德看来，敬虔派强制性地要求学生进行自我反省这种做法本身就有虚伪性导向。我们知道，路德宗神学认为，人的本性已经败坏，不可能靠自己认识自己的罪性，因而人只能在上帝的恩典中认罪。敬虔派进一步发挥这一原则，宣称人人都有罪，需时时反省自身，认识自己灵魂深处的罪性，从而能够去感谢并领受上帝的恩典。既然人不可能依靠自己而认罪，那么，外在要求就是必须的。敬虔派把上帝恩典这种外在要求转换为学校教育要求，从而强制学生进行自我反省。康德在中学时是一个乖孩子，对学校的各种要求都努力遵循。但是，康德的父母要求康德成为一个诚实的不说谎的孩子。康德在反省中一定会遇到自己认为好但不合乎学校官方规定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从诚实原则出发还是从学校要求出发呢？违反学校要求是会受到惩罚的；遵循学校要求则不得不说谎。不难想像，学生们为了避免惩罚而说谎这样事例不在少数。因此，康德认为这种反省所培养的是虚伪人格。

如果这种反省带来的是虚伪，人就不可能在反省中培养自己的善性。那么，人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善性？康德的早年生活至少让他经历了三种善：第一种是上帝之善。在敬虔派家庭里，上帝、恩典、罪恶、基督、祷告等等这些名词每天都无数次挂在嘴上。对于父母所敬拜的上帝，康德决不敢有任何微词。因此，上帝之善通过父母之爱已经在康德心中根深蒂固。但是，随着他的生活趋向独立，何为上帝之善就成了重要的问题。第二种是康德就读的腓特烈中学强加给他的善，通常是在上帝的名义下宣布为善。康德在他的中学生活中常常无法接受这种“善”。当然，他并没有一概地否定这种“善”，但至少会怀疑它的善

性。也就是说，这种“善”不能奉为培养善性的出发点和基础。第三种是他在自己内心中体会到的善。这种善往往和学校或者社会所公认的善不一致。但是，如果诚实地面对自己，他无法否定其善性。

这三种善当中，第一种和第二种被宣告为彼此一致；不过康德无法接受这种说法。第一种和第三种之间关系尚未建立；康德希望能够建立它们的关系。第二种和第三种则是常常相冲突；康德从诚实出发坚持自己体会到的善，但也希望能够解释冲突的原因。这三种“善”之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康德。我想，如果读者以此为主线来阅读康德的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就会发现康德的思想是活生生的，并不抽象和晦涩。

康德用来评价他的中学教育的第二个词是“奴性”，他回忆说，他年轻时“被当作奴隶看待”。奴性或奴隶指的是这样一种人格：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只凭主人意志是从。我们知道，腓特烈中学十分强调学生的顺服和纪律，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节制力，不受各种欲望的支配（摆脱世俗世界的控制），成为一心向神的敬虔派基督徒。顺服是基督教的主题。路德在谈到“顺服”一词时指出，鉴于人的本性败坏，人无法依靠自己向善，因而必须相信耶稣，接受恩典。顺服就是为了接受上帝的恩典。腓特烈中学以培养造就上帝的子民为己任，认为他们所做的都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因此，顺服是对上帝旨意的顺服。但是，对于学生来说，顺服无非就是接受学校加在他们头上的各种教训和规范。康德发现，他所体会到的善和学校加给他的善往往不相一致，因而这样的顺服——在强制性纪律的约束下接受某种外在的善——是违背他的意志的。对于康德来说，不尊重他的意志等于把他当奴隶看待。

需要指出的是，康德是一个乖孩子，所以在严格的中学教育中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这就是说，康德在中学时是顺服的、守纪律的。我们没有读到康德批评腓特烈中学的严格纪律的言论。反而，他的道德哲学认为，规范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因为没有人能够过一种没有规范的生活。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从来就是循规蹈矩的；这样做给他省了很多麻烦。像打破规范束缚之类的想法大概没有在他思想中停留过。康德关心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受缚于各种外在规范，因而只能过一

种“作茧自缚的蒙昧生活”。如果规范是必须的，如果受缚于规范是一种蒙昧，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种在规范束缚中的生活吗？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像腓特烈中学的那种纪律和规范只会使人越来越蒙昧。而且，康德还认为，人能够走出这种蒙昧生活是难之又难。他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以自己的心灵努力，挣扎暗无天日的蒙昧，稳健地往前走。”^{*}然而，这里说的“心灵努力”是什么样的一种努力呢？这个问题便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

第三个词是“傲慢”。康德使用“傲慢”这个词时其适用范围应该宽泛些，不仅仅适用腓特烈中学的官员们，也适用于所有的那些握有权力的敬虔派基督徒。这些人自以为拥有了真理，因而可以去教训别人。这就是傲慢。我们知道，康德在生活中循规蹈矩，避免和当权者发生冲突。即使面对“你到底信不信上帝”这种傲慢问题，虽然十分反感，但为了不冲撞询问者，他还是做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康德在敬虔派家庭中培养起来的诚实使他无法简单地否定自己所体会到的善。在坚持自己体会到的善同时，康德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压力：这些人不但自以为拥有真理，而且还要把“真理”强加给别人。康德在他的思想中顶住了这种傲慢的压力。康德凭什么顶住了这种压力呢？我们无论读哪一本康德传，这个问题都是导读性问题。

看来，康德的中学教育没有培养他的善良意志情感。我们进一步考察，康德在面对善观念冲突时不断地回到他的诚实中。诚实归根到底是不能对自己说谎。我们知道，康德是一个乖孩子，而且还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可以这样设想，康德在中学生活中会遇到不少诸如此类的两难境界：有些事情自己内心认为善，而学校当局看为恶；有些事情则反过来。摆在康德面前的问题是，究竟应该从哪个标准出发来进行评价呢？服从学校当局无异于放弃自己的诚实。我们看到，在这两个标准之间，康德还是倾向于他的诚实。不难指出，这两种力量对比悬殊：学校当局之善反映了整个社会对善的理解，在宗教上甚至得到了上帝的支持（因

* 参见本书第 87 页。